

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 夔州诗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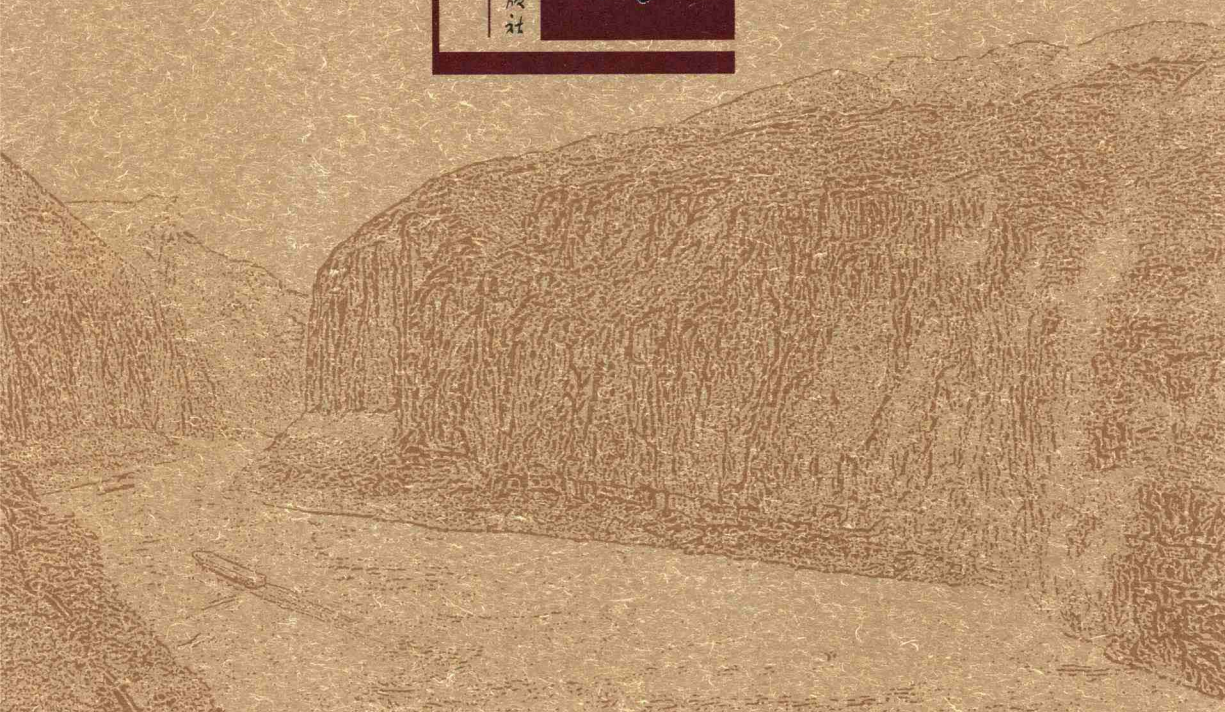
清代卷

主 编◎滕新才

重庆古籍丛刊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 夔州诗全集

清代卷

主编 滕新才  
副主编 唐刚 李江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 前 言

中国诗歌经历了唐宋两代的辉煌，在元明通俗小说、戏剧的冲击下进入清代，结合社会历史的变迁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清诗数量之多居历代之冠，民国大总统徐世昌（1855—1939年）《晚晴簃诗汇》收录清诗 6100 家，未入选者尚不下 4000 家，远迈唐宋。清诗作家众多，流派纷呈，风格迥异，题材广泛，几乎涉及传统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使已经走向衰微的古典诗歌又呈现出中兴的局面。清诗的这些特点在夔州诗群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 名家辈出的创作主体

夔州素称“诗城”，雅号由来已久，吟诗、赋诗、和诗、刻诗的传统源远流长。清代夔州诗群蔚为大观，名家辈出，灿若星汉，以其杰出创作名垂青史，同时也使清代夔州诗备受世人青睐。

清代夔州诗群中地位最高、影响最大的诗人首推康熙帝玄烨（1662—1722年）。有清一代皇室，饱读诗书、学识渊博者不乏其人，而像康熙这样精通文学、史学、书法、绘画、数学、医药学、天文学、地理学、植物学的大家，却是凤毛麟角。《康熙御制诗文集》昭示了作者苦心孤诣的文学才华，更以一首《赐傅作楫》的六言绝句扛起了



夔州诗的大纛。

清代夔州诗创作最丰的诗人当数王士禛和张问陶，分别为 30 首和 34 首，此二人皆清代诗坛巨擘。王士禛（1634—1711 年）字贻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今山东桓台县）人。出身于晚明官宦世家，幼承庭训，即擅诗文，受到诗坛盟主钱谦益（1582—1664 年）的赏识，许他代己而起，主持风雅。在康熙诗坛上，王士禛稳坐第一交椅，继钱谦益、吴伟业（1609—1672 年）为一代宗匠，创清诗“神韵派”。其论诗主旨与钟嵘“滋味”说、司空图“韵外之致”说声气相通，尤以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严羽《沧浪诗话》“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为最高境界，极力追求诗歌创作的“味外味”。“味外味者，神韵也”，要求诗歌具有含蓄深蕴的意境和言尽而意不尽的艺术魅力。

夔州是中国诗歌的一座大洪炉。杜甫夔州诗凸显了“诗圣”炉火纯青的诗艺，前人称杜甫“诗到夔州老更工”（曹之谦：《寄元遗山》，房祺编《河汾诸老诗集》卷八），此言不虚。南宋陆游亦是以入蜀任夔州通判为契机实现了诗风的脱胎换骨，他自己曾说：“我初学诗日，但欲工藻绘。中年始稍悟，渐欲窥宏大。”（陆游：《剑南诗稿》卷七十八《示子适》）所谓“中年始稍悟”，是指乾道六年（1170 年）陆游 46 岁入蜀从军后，雄峻壮丽的巴山蜀水唤醒了他宏肆奔放的灵感，金戈铁马的戎马生涯激发了他爱国忧时的热情，从而发生了“诗家三昧忽见前，屈贾在眼元历历”（《剑南诗稿》卷二十五《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的巨大变化，抛弃了精工藻绘的诗风，转入英雄恣肆的境界。故“乾隆三大家”之一的诗人赵翼（1727—1814 年）总结说：“放翁诗之宏肆，自从戎巴蜀，而境界又一变。”（赵翼：《瓯北诗话》卷六）历史竟然惊人的相似，到了清代，巴山蜀水再一次成就了王士禛诗歌发生质的飞跃。

康熙十一年（1672 年），王士禛典试四川，所著《蜀道集》一扫此前迷蒙玄远、清幽淡泊的诗风，变得意境开阔，手法雄奇，风格苍劲，气概非凡，成为他诗风转变的里程碑。《登白帝城》、《瀼西谒少陵先生祠五首》、《和吴渊颖题袁子仁〈巴船出峡图〉》、《舟下瞿唐别陈东海都督》、《登高唐观》、《西陵竹枝词四首》等诗作，真实地记录



了他三峡之行的心路历程。其中《晚登夔府东城楼望八阵图》、《白帝城谒昭烈武侯庙》等诗，即景感怀，凭吊历史遗迹，状摹名城形胜，抒发兴亡感慨，道不尽沧桑沉重，声情悲壮，有“诗圣”杜甫之遗风。而《螭矶灵泽夫人祠二首》、《送顾马胡孔昭三首》等诗，则写得轻健明快，晓畅自然，格调激越，旖旎清新，如春风拂面，涟漪阵阵，沁人心脾。同时代诗人施闰章（1618—1683年）评价王士禛入蜀前后诗歌风貌的转变说：“往日篇章清如水，年来才力重如山。”（施闰章：《施愚山全集》卷三十九《学余诗集》）切中肯綮，点明了王诗深广厚重的思想内容。

作为四川本土诗人，张问陶（1764—1814年）吟哦夔峡山水，更享地利之便。所著《船山诗草》，涉及夔州题材的作品不在少数，《瞿塘峡》、《白盐赤甲》、《瞿塘巫峡》、《黑石》、《大溪口风雪》、《大溪口守风四首》、《舟中遥望巫山二首》、《峡中作》等诗，皆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免为佳什。《风箱峡绝壁上人家》、《峡中谢人送橘柚》诸篇，则是诗家本事，采风问俗，用心良苦。《夔州怀少陵》、《上真观》等，凭吊古迹，缅怀先贤，以弘扬诗歌正统为己任。张问陶诗论与“乾隆三大家”之一的袁枚（1716—1797年）甚相契合，以“性灵”为宗。所谓“性灵”，就是指诗歌创作必须表现诗人自己的个性才情和切身感受，论其实质则是继承了明代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袁宏道：《袁中郎集》卷四《叙小修诗》）的文学观而有所发展，又吸取了王士禛“神韵派”注重个性的特点，既反对形式主义，又反对拟古主义，对清中叶诗坛模拟复古、烦琐考据的诗风是一个有力的冲击，是晚明进步文艺思潮的隔代重兴，为清诗开创了新的局面。

张问陶做诗多“骚屑之音”，其《论诗十二绝句》公然宣称“天籁自鸣天趣足，好诗不过近人情”。为了让诗歌创作更加“近人情”，他甚至可以毫无顾忌地表现夫妻之间的“房帟钟情”，写出了“春衣互覆宵寒重，绣被联吟晓梦清”的纯真，畅所欲言，直抒胸臆，成为“性灵派”的得力干将，也因此受到袁枚的激赏。当张问陶第一次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小仓山之随园拜见袁枚时，袁枚不无感慨地说：“所以老而不死者，以未读君诗耳！”（赵尔巽：《清史稿》卷四百九十二《张问陶传》）宗师对门生如此称许，表明张诗确实已深得“性灵



派”真传，在“吟咏性情”的基调上与袁枚旗鼓相当，为完善“性灵派”诗歌理论纵横驱驰，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这样的创作风格在张问陶 34 首夔州诗中可以找到极好的注脚。

清初诗坛上还有两位重要诗人，一是宋琬（1614—1674 年），二是朱彝尊（1629—1709 年）。宋琬与施闰章齐名，称“南施北宋”；朱彝尊与王士禛并驱，称“南朱北王”。四人皆由明入清，在新朝中应举仕进，领袖诗坛。除施闰章与夔州诗无涉外，宋琬《拜杜少陵草堂》、朱彝尊《送王援入蜀省其尊人观察庭》，皆以其苍凉激荡、感慨深沉的创作为清代夔州诗增色添彩。

在中国文学史上，词被称为“诗余”。这个称呼的蕴涵是：诗词同源，本属一体，填词与写诗一样，理应抒发作者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苏轼就曾高屋建瓴地指出，词“为诗之苗裔”（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上）；“微词婉转，盖诗之裔”（苏轼：《东坡全集》卷六十三《祭张子野文》）。词与诗虽然有外在形式的差别，但二者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实际上是一致的。两宋词登峰造极，无与伦比，元明远逊，望尘莫及，唯清代差可比拟，存亡继绝，成为词史上的中兴时代。鼎鼎大名的“清词三大家”，除阳羨派词宗陈维崧（1625—1682 年）与夔州诗无涉外，浙西派魁首朱彝尊，不傍门户、卓然自成一家的满族词人纳兰性德，皆有佳篇妙构传世。

朱彝尊的词名更甚诗名，与陈维崧并称“朱陈”，执词坛之牛耳，开清词新格局。他把南宋姜夔、张炎的创作奉为最高典范，提倡“字琢句炼，归于醇雅”（谭献：《篋中词》卷上），要求词作具有古雅峭拔的格调，疏淡清远的意境，和谐严谨的音律，宴嬉逸乐的功能。其《东风齐着力》一阙，写出了“巨石拥中央，舟一叶过时，险甚瞿塘”的气势，也抒发了“滩声急，断矶青树，又挂残阳”的沉郁，确实字琢句炼，清空醇雅，绝无浓艳浮华之弊。

纳兰性德（1655—1685 年）原名成德，因避康熙太子允礽（小名保成）之讳而改名性德，字容若，满洲正黄旗人。其父明珠（1635—1708 年）曾任武英殿大学士，刑、兵、吏三部尚书，加太子太傅、太子太师，声威显赫，权倾朝野。纳兰性德自幼聪颖好学，从国子监祭酒徐元文（1634—1691 年）习经史，有高深的汉文学修养。22 岁中



进士，工骑射，官至一等侍卫，可谓少年得志，前程似锦。惜天不假寿，英年早逝，31岁病故。著有《通志堂集》，词集名《饮水集》。

纳兰性德是一位少年早慧、才华横溢的词人。他的词或写离愁别恨、羁旅凄凉，或写边塞风光、鞍马劳顿，或写儿女私情、闺房琐事，尤以柔肠寸断的悼亡词独步古今。陈维崧评：“饮水词哀感顽艳，得南唐二主（中主李璟、后主李煜）之遗。”国学大师王国维亦推许他为“北宋以来，一人而已”（王国维：《人间词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然《临江仙》一阙，一扫纤靡之风，以“原是瞿塘风间阻，错教人恨无情”起兴，抒发了“几回断肠处，风动护花铃”的惆怅，与他另一首脍炙人口的名作《长相思》中“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丈灯”（纳兰性德著、张草纫笺注：《纳兰词笺注》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的“千古奇观”有异曲同工之妙。二词在血融于水的乡愁、迁怨于物的心态上昭然相似，写法则不事雕琢，纯用白描，运笔如行云流水，任由感情在笔端倾泻，一路淋漓尽致写来，个性鲜明，真挚感人，令读者一掬热泪。关于《红楼梦》的创作主题，历来有“明珠家事说”，纳兰性德被指为贾宝玉的原型。此说虽未必可靠，但足以表明纳兰性德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之重要，影响之深远。

此外，清代夔州诗群还包括王夫之（1619—1692年）、毛奇龄（1623—1713年）、程可则（1624—1673年）、陈恭尹（1631—1700年）、彭端淑（1699—1779年）、李调元（1734—？）、陶澍（1779—1839年）、龚自珍（1792—1841年）、刘光第（1859—1898年）等著名诗人；朝廷重臣如吏部左侍郎熊文举（1595—1668年）、吏部尚书熊赐履（1635—1709年）、翰林院侍讲方象瑛、翰林院侍读樊泽达、左副都御史傅作楫（约1661—1727年）、太常寺卿高层云、左都御史吴省钦、吏部尚书晋武英殿大学士卓秉恬（1781—1855年）；封疆大吏如四川布政使方积、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李星沅（1797—1851年）、广东布政使江国霖（1811—1859年）、湖南提督鲍超（1828—1886年）、广西布政使刘心源（1848—1917年）；地方要员如夔州知府吴美秀、许嗣印、胡期恒、李复发、江权、杨世英、英贵、李在文，同知王知人，奉节知县李作梅、吕辉、耿士伟，江西南康知府周灿，赣宁



道董榕，山西雁平兵备道赵文楷，浙江钱塘知县汪仲洋，广州知府陈镇，贵州琅岱府同知司为善，陕西商南知县曹珍贵，湖南平江知县张宗世，桃园知县孙桐生，福建霞浦知府刘玉璋，上海知县李超群，广东钦廉道易顺鼎，湖南桂阳知县陈正学，直隶顺义知县余启志，四川汉州知州孙元恒，巫山知县许光澍；府县学官如张凤翥、朱有绂、李成芳、杨德坤、王藻鉴、谢永龄、邱景迟、王怀曾。他们或为奉节本籍，或为外来游宦，皆科举及第，金榜题名，立功立言，志在不朽。他们以辛勤的努力，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国计民生、文治教化奔走操劳，为维护夔州这座古老的“诗城”增砖添瓦。

### 磅礴郁积的伟人情结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有曰：“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三不朽”从来是中华民族所期许的道德自我完善的最高境界，也是历代文人倾情讴歌的完美人格，清代夔州诗群亦复如此。在诗人们看来，诸葛亮辅佐圣君明主，终生为复兴汉室而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杜甫饱经风霜，颠沛流离，仍忧国忧民，痴心不改。从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年）四月抵达夔州，到大历三年（768年）正月离夔出峡，在这1年零10个月内，杜甫共赋诗429首，如果再加上云安诗32首，共达461首，占他生平诗作的1/3，将一代“诗圣”的诗艺人生推向了顶巅。因此，诸葛亮和杜甫是人们心目中立功、立言的典型，为后世树立了光辉的楷模，诗人们不惜华章丽辞热情讴歌他们，表现出浓郁的伟人情结，挥之不去，紫积心田。

诗人们凭吊诸葛亮遗迹，对八阵图表现出强烈的兴趣，直接以八阵图为诗题的作品计21首，占清代夔州诗总数的3.9%。八阵图本是古代作战的一种阵法，传为诸葛亮所创。其实，八阵图并非诸葛亮首创，其名始见于《孙臧兵法》，南宋时郑樵《通志》著录有《孙子八阵图》一卷。研习八阵图者，在诸葛亮前有东汉窦宪，其后有东晋桓温、北周陆腾、唐代李靖、明代蓝章等人，但以诸葛亮推演的八阵图流传最广，影响最著。《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亮性长于



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咸得其要云。”其遗迹有三处：北魏酈道元《水经注》记为沔县（今陕西勉县）诸葛亮墓东；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说在奉节江边，有水八阵、旱八阵之别；《大明一统志》说“在新都县北三十里弥牟镇”。诗人们不遗余力地考察八阵图，探索其玄妙，赞叹其机巧，景仰诸葛亮的聪明才智，赞美他为支撑蜀汉残局而只手擎天的顽强精神。这类诗作以王士禛《晚登夔府东城楼望八阵图》为代表：

永安宫殿莽榛无，炎汉存亡六尺孤。  
城上风云犹护蜀，江间波浪失吞吴。  
鱼龙夜偃三巴路，蛇鸟秋悬八阵图。  
搔首桓公凭吊处，猿声落日满夔巫。

本诗即景感怀，吊古伤今，浸透了历史的沧桑凝重。首联以永安宫的萧瑟起兴，颌联化用杜甫“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句而不露斧工痕迹，颈联渲染八阵图的奥秘，尾联借猿声、夕阳意象将王朝盛衰的感伤推向时间、空间的无限。全诗意境开阔，风格遒劲，词句圆润，音节跌宕，显示了作者驾轻就熟的诗艺才情，确属“才力重如山”的佳作无疑。

如果说王士禛身处明清易代之际，内心深处多少还潜藏着物是人非、故国难再的幻灭感的话，那么，当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清朝局势逐渐稳固之后，沐浴着“康熙盛世”阳光雨露的诗人们，则毫无芥蒂地抛弃了鼎革初的迷惘与失落，转而追求洒脱和玄远，对八阵图的凭吊自是别样意绪。这类诗作以奉节籍诗人余德中《八阵图》、夔州府同知（副知府）王知人《武侯阵图》为代表：

三分早向隆中定，八阵长留井落天。  
磧上纵横连楚塞，原前磊落接秦川。  
云移树色旌旗动，雨听江声鼓角悬。  
戎马无情炎汉尽，秋风飒飒使人怜。



无劳樵牧殷勤说，此是当年八阵图。  
报主不遗生活计，丹忠犹下死功夫。  
寒流脉脉萦荒碛，苦雨萧萧走夜芦。  
浩魄不磨英气在，空灵婉转乱啼乌。

诗人们不以成败论英雄，正像李清照高歌“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称赏的是“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豪情一样，新一代诗人浓墨重彩推许的也是诸葛亮“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的报主丹忠。这种思路深刻地启发了后世学人，不再以“出师未捷身先死”为人生遗憾，而更注目于“浩魄不磨英气在”的永垂不朽。可以说，八阵图留给中华民族的文化意蕴，远比阻遏陆逊悬军深入夔门、抵挡司马懿重兵南下汉中的军事意义要重大得多，它留给后世子孙的宝贵财富，将永远是一种自强不息、锲而不舍的精神鼓舞，和朝虔夕惕、居安虑危的辩证思维。

与诸葛亮事功紧密联系的遗迹还有白帝城。它本是公孙述为抗拒东汉而修筑的城防，却因附会了刘备“白帝托孤”的悲壮故事而名闻天下，开创了历史上坦诚交代家事国事天下事的范例，刘备和诸葛亮也因此被推崇为“明君良臣”的最佳政治搭档；而公孙述跃马称帝则被讥为不自量力，成了毫无见识的井底之蛙。清代夔州诗直接以白帝城为题的作品有40首，占总数的7.5%。这类诗作仍以王士禛《白帝城谒昭烈武侯庙》为翘楚：

赤甲山头云气苍，枫林萧瑟落微霜。  
渔人故垒生秋草，鸟道寒空挂夕阳。  
当日君臣真洒落，至今祠庙有辉光。  
江流薄暮闻笳鼓，回首中原泣数行。

全诗描绘了白帝城的风景形胜，气韵沉稳，含蓄空灵，富有诗情画意，以创作实践丰富了“神韵派”在意境上追求冲和淡远、风神独绝的理论。

而鄙薄公孙述的诗作则以奉节籍诗人谢永龄《白帝城》为代表：





咄咄公孙志太奢，暗奸天位据三巴。  
城中马屨城边草，井里龙成井里蛙。  
仪仗漫夸新殿陛，乾坤仍属旧官家。  
空残粉堞环狐穴，苦雨凄风急暮笳。

这类诗作多据《后汉书》卷五十四《马援传》的记载：“（马援）归谓（隗）嚣曰：‘子阳（公孙述字子阳），井底蛙耳！’”纵横议论，曲尽其意，甚至连深得康熙帝器重的傅作楫，寓居夔州期间所赋《子阳城歌》，竟直呼曰：“吁，嗟乎！井底蛙，公孙述！”对公孙述的冷嘲热讽，正反衬了对刘备、诸葛亮君臣大义的赞美，恰如同治（1862—1874年）间四川诗人王怀曾《白帝怀古》所咏：“明良事付三椽殿，龙虎春消八阵图。”于是，公孙述与白帝城、白帝庙的渊源更加湮没无闻。

杜甫是中国文学史上难以仰望的高峰，他的诗歌与“诗仙”李白、“诗佛”王维的作品交相辉映，构成了古代知识分子的三种人格精神，是天地人“三才”中的地，是真善美“三境”中的善。以饥寒之身而怀济世之志，处穷迫之年而虑君国之忧，杜甫以其博大的仁爱精神，铸就了千古不朽的伟大风范。难怪清代夔州诗群对杜甫如此推崇备至，或拜谒杜甫草堂，或寻访东屯故居，或瞻仰后世纪念性建筑诗史堂，或对少陵画像虔诚膜拜。此类诗作共计37首，占清代夔州诗总数的6.9%。特别是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江权任夔州知府时，鉴于东瀼、西瀼和白帝城各有一处杜甫故居，将位于鱼复浦中介地带的原晋阶书院改建为杜工部专祠。落成之日，江权、前任夔州知府李复发、莲峰书院山长张凤翥及府县官员、地方名流、文人学士济济一堂。江权赋《杜公祠落成》七律诗一首，众人竞相唱和，共得七律13首。此为“诗城”历史上一次空前的盛会，也为夔州文坛平添一段佳话。

怀杜诗作以奉节诗人刘玉铨《谒杜公祠》最为典型：

谁知爱国忠君意，尽入穷愁作浩歌。  
万里烽烟乡信绝，五陵衣马故人多。



风尘回首思归去，霜雪盈头奈老何！  
毕竟涓埃犹未答，天涯吟望苦蹉跎。



诗人对杜甫寓居夔州的老病穷愁表示了极大的同情，触摸“诗圣”心灵深处的孤苦无告，特别是呼应了《野望》“唯将迟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圣朝”的无可奈何，与杜甫当年的忧愤穿越了历史时空的间阻而和谐共鸣，此之谓“金声玉振”。这里所谓的“金声玉振”，既有《孟子》“集大成”的本义，“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孟子·万章下》）；更有后世倡导做诗须音韵响亮、格律和谐的诗家本事，恰如明代“后七子”之一的谢榛（1495—1575年）所论：“诵之行云流水，听之金声玉振，观之明霞散绮，讲之独茧抽丝，此诗家四关。”（谢榛：《四溟诗话》卷一）清代诗人与杜甫相距千余年，异时同地的感受竟是如此相似。中国文学的爱国主义优良传统虽然并不肇始于杜甫，然其“平生方寸心”、“穷年忧黎元”的博大胸怀，经陆游“谁知壮士心”、“忍死望恢复”的高蹈，这条“爱国忠君”的大道在清代诗人脚下越走越宽广，成为既“始条理”又“终条理”的爱国主义集大成者。

蟠曲郁积的伟人情结还体现于夔州诗群对苏轼的崇拜，尤以奉节诗人刘玉璋（1842—1915年）最为痴迷。苏轼是一位典型的逆境天才，英华盖世却一生坎坷，一次又一次的贬谪使他愈挫愈奋，文学创作也随之进入了精深华妙的境界。他晚年曾自题画像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查慎行：《苏诗补注》卷四十八《自题金山画像》），点明了三次贬谪对他文学事业的玉成。苏轼坚定执著、旷达乐观的生活态度，进退自如、宠辱不惊的人格魅力，为后世树立了一座完美的丰碑，令刘玉璋钦羡不已。他于同治四年十二月十九日（1866年2月4日）苏轼830岁冥辰召集同仁为东坡寿，供诗集代像，醉后作长歌纪事，对苏轼的诗艺人品表示了无比的崇敬：

我读坡仙诗，如睹坡仙面。坡仙去我八百年，长髯飘飘  
犹如见。读黄州诗，我如足踏赤壁巅。读西湖诗，我如身在



孤山畔。夜窗风雨才开卷，均如有我侍笔砚。诗中有先生，何必更生我？此世无先生，生我天曰可。千载而上乐洋洋，千载而下狂颇颇。

诗人盼望能像苏轼那样，无拘无束地徜徉在诗的海洋中，破除一切樊篱，我口写我心，“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赵翼：《瓠北诗话》卷五）。为此，他设想了对苏轼的如许礼拜：

我诗公不知，我狂公定喜。今世何世？同治乙丑。今夕何夕？丑月十九。呼小奚奴招某某，以诗代像供南牖。幼者童冠老者叟，若崩厥角稽其首。一瓣香，千斛酒。香在炉，酒在手。如此良宵饶辜负，万古安能传不朽？玉山倒如杵投白，天衾地枕响声吼。梦中先生来，呼我作小友。笑言尔今日，如鱼丽于罟。一日有人逝尔之梁发尔筭，置尔长江大河游清浏。龙门烧尾脱尘垢，望古何须名心陡！我闻公言胸如积尘忽遇扫云帚，浮一大白为公寿：愿公为作图，图我今日雅人雅事传之千秋后；不然赠我雄文追韩柳，不然赠我新诗作琼玖。仰天大笑问先生：“狂生狂，狂乎否？”

诗中希望借苏轼的才力帮助自己臻于诗艺绝境的心愿非常明显，向往苏轼那样不拘一格、洒脱磊落的性情更溢于字里行间。应该说，这种心态不仅仅属于刘玉璋个人，而是宋代以后众多诗人所共有的。时隔20年后的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1887年1月12日），刘玉璋正在福建为官，夔州故人偶来闽中，使他“忽忆二十年前此日同祀玉局翁，以诗代像咸鞠躬，香满筒，酒满盅”的盛会。此时的刘玉璋，已不再是当初那位年仅二十、血气方刚的小青年，而是经历了中法马尾海战血与火的洗礼、饱含民族忧患的“通儒循吏”，人生中大彻大悟，“不知身世何者为穷通”；诗艺上也精益求精，参透了“境愈穷，诗乃工”的审美意蕴，逐渐臻于化境。故而民国初年刘玉璋以老病归里时，行李萧索，两袖清风，令人感慨。循吏之名不枉，刘玉璋是夔州诗群的骄傲。



对伟人的景仰日渐积淀，便产生了“十贤祠”的建造。北宋庆历（1041—1048年）中首先建祠祭祀，初名岁寒堂，又名忠孝堂，后正式定名为十贤堂，祭祀与夔州有关的十位历史文化名人，分别是屈原、诸葛亮、严挺之、杜甫、陆贽、韦处厚、白居易、柳镇、寇准和唐介。以后“十贤”有所增改，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仲纯信任夔州知府时，因原“十贤堂”年久失修，渐趋湮没，特设主位于莲峰书院，祀北宋理学家周敦颐（濂溪）、南宋文学家夔州知府王十朋（梅溪）、明初大文豪宋濂（潜溪），又增加北宋哲学家邵雍、奉节知县唐介、南宋四川宣抚使虞允文、夔州通判陆游、剑南东川节度推官刘光祖、一代名将孟珙和阎惠夫七人，称为“夔州后十贤祠”。十贤堂使夔州人崇拜伟人的情结有了物质皈依，同时也成为诗词曲赋创作的渊薮，诚如奉节籍诗人王藻鉴所吟咏：“自古贤良相继迹，于今想见有三溪。”

### 沉醉自然的山川情怀

有学者指出：“山水诗是继神话之后，在文学创作上大自然的又一次的人化。”（林庚：《中国文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72页）山水诗的出现，被称为是“诗运一转机也”（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把山水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标志着人与自然的进一步沟通和深层次和谐，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

古人从来视登高览胜、赋诗缀文为大才，《诗经·邶风·定之方中》毛传有曰：“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元代方回著《瀛奎律髓》，首列“登览类”，理由是：“登高能赋，则为大夫，于传识之。名山大川，绝景极目，能言者众之。”（方回：《瀛奎律髓》卷一《登览类》）清代夔州诗亦不例外。夔门自古天下雄，白盐赤甲巍然耸立，滚滚长江奔流不息，滟滪堆、虎须滩险不可测，这一切都激荡着清代诗人的山水情怀，写下了大量沉醉于自然美景的诗篇。据统计，以夔门、瞿塘峡、滟滪堆及其附近景物为诗题的作品共55首，占清代夔州诗总数的10.3%，是所有分类中比例最高的一组题材。

试看奉节籍诗人张宗世的《赤甲晴晖》：



岸然张掖竦晴空，袒裸犹存太古风。  
我正昂头向天外，君先振臂入云中。  
山肩高耸如人瘦，苔发全无讶尔童。  
火色漫夸腾上速，日光宠借十分红。

诗人轻松自如地运用拟人手法，想象雄奇，如同与赤甲山的对话，娓娓交谈，亲切可人。把冰冷无情的山岩化为和易可亲的挚友，作者显然参透了“山水以形媚道”（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六引宗炳《画山水序》）的谐趣，才会把赤甲山写得如此生动可爱。

又如奉节诗人王陈锡对滟滪堆的描写：

滚滚飞澜势莫收，屹然一柱砥中流。  
孤根偏托风涛险，拳石还因宇宙流。  
潭底蛇龙争倚伏，江心象马任沉浮。  
缘思神禹垂遗爱，锁钥功勋孰与俦？

诗中将滟滪石突兀江心，如中流砥柱、激起万顷狂浪的气势揭示得酣畅淋漓，并结合古谣谚“滟滪大如象，瞿塘不可上；滟滪大如马，瞿塘不可下”的拙朴，令读者浮想联翩，思绪悠悠，追溯天地开辟之初宇宙的洪荒迷蒙，顿生人力渺小、自然神奇之慨，不由得叹为观止。

对夔峡山水体验最深刻的诗人当数张问陶。他的《瞿塘峡》、《白盐赤甲》、《瞿塘巫峡》、《风箱峡绝壁上穴居人家》、《黑石》、《大溪口风雪》、《大溪口守风四首》、《舟中遥望巫山二首》等诗，本身就组成了一幅神奇瑰丽的三峡壮游图：

伏枕千峰底，江声午夜寒。  
雪花鱼复垒，风力虎须滩。  
峡逼天真小，途长岁易残。  
妻孥应笑我，日日著诗难。



云雪英英白，奇峰高刺天。  
四周山斗绝，五色树莺然。  
石泐泉香细，村藏竹影圆。  
恨无荆浩笔，画此峡中船。

诗人对自然景物的观察是十分细致的，重峦叠嶂高耸云霄，滔滔长江汹涌澎湃，一静一动，谐趣盎然；漫天飞舞的雪花在夔州上空飘扬，尖利呼啸的北风肆虐着浪高水急的虎须滩；悬崖绝壁巍峨挺拔，把蓝天逼成了一抹细线。仰望高处，白雪皑皑，碧峰刺天；俯瞰峡中，却是清泉淙淙，绿竹婆娑。特别是描写群山连绵的“斗绝”和林木葱郁的“莺然”二词，将大自然的空旷寥廓与红尘间的蓬勃生气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象有机地组合起来，“雪英英”与“树莺然”的色彩搭配又是那样的赏心悦目，而“泉香细”和“竹影圆”的桃源风光更让人心神向往，表明诗人徜徉山水，恣意遨游，早已抛却俗累，沉醉自然。面对这样的美景，诗人不禁自我解嘲：要想每日都赋新诗，那可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诗人最后遗憾地表示：可恨没有像五代画家荆浩那样的巨笔，不能将峡中游船淋漓尽致地摹绘出来！这样的遗憾实际上是一种陶醉的欣慰，是喜出望外的满足。心随景动，景因情生，情景交汇，作者也与自然山水浑融为一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夔州这块神奇的土地，以其独特的战略地位，吸引着历代雄师健将在这里叱咤风云、斗智角力，演绎出了灿烂的军事文化。康熙二十年（1681年）四川乡试解元樊泽达《瞿塘峡》一诗对此不无感慨：

谁凭霄汉劈青苍？天险由来古战场。  
八阵风云连滟濒，三巴门户锁瞿塘。  
乌蛮塞远江流合，白帝城高草木荒。  
峡路愁人从此始，哀猿啼处过飞航。

诗中列举了“八阵风云”、“三巴门户”、“乌蛮塞”、“白帝城”四组古迹，将汉唐战事与江山形胜紧密联系起来描写，寓情于景，感



慨深沉。在其他诗人笔下，还涉及岑彭入峡阵斩任满、廖永忠奇兵度险飞夺夔关等史实，殷勤细语，如数家珍。然而岁月沧桑，历史无情，英雄人物俱为过往云烟，瞿塘峡却依然雄峙傲立，成为中华民族光辉历程的见证。面对壮丽的河山，任何华夏儿女都会油然而生保家卫国、热爱故园的赤子之心。这种深沉的山川情怀，在近代帝国主义入侵、神州瓜分豆剖的严峻形势下，演化为浓烈的忧患意识，唤醒国人的自觉，为探索救国救民真理、复兴民族伟业而努力奋斗。清末爱国诗人金沙《瞿塘峡》诗就对关山阻隔、列强凭陵的局势不无忧虑：

久擅神州绝险名，高峰欲上远瑶京。  
波涛万派轰今古，日月双轮涌晦明。  
滟滪柱擎天府地，瞿塘秋锁杜鹃声。  
秦关燕塞无消息，一任金汤付虏兵。

诗中对瞿塘险塞极力赞美，而清朝屈辱妥协的外交政策却将祖国大好河山尽付泰西，令诗人感到万分激愤。川籍诗人洪锡爵（1839—1904年）《闻洋船入川议成感赋》诗更为帝国主义势力深入内地而大声疾呼：

汉唐昔建国，镇抚重疆帅。  
务慎边圉防，绝无外邻觑。  
自从海门开，轮船纷纷莅。  
长江天堑雄，往来如儿戏。  
逞彼无厌求，复萌望蜀意。  
圣朝崇宽大，中外无二致。  
广施雨露恩，许通舟楫利。  
从此古蚕丛，崎岖化坦易。  
我本蜀都人，宦迹鄂渚寄。  
遥遥赤甲山，可望不可跂。  
挾此火轮飞，千里一日至。  
藉慰还乡心，足骋波浪志。